

东北历史与文化论丛 第四卷

新慎族渊源与演变

郅正邵汉明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

王 鍾 翰

满洲作为民族名称（简称满族），是在 17 世纪 30 年代^①才出现的。但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漫长的岁月里，满族先民生息、繁衍、活动在祖国东北地区的“黑水白山”之间，一直到明代末年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才分散遍布于关内外（据 1978 年调查，满族人口有 265 万^②，辽宁省占满族总人口的 40% 以上），是今天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

如果按照传统的民族定义^③来衡量，迄今，世界上许多国

① 《清太宗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下同）卷二五，第 29 页上，天聪九年（1635 年）冬十月庚寅条。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下同，1932 年版）卷一第 1 页下有云：“其国定号满洲”，小注云：“南朝（指明朝）误名建州。”所说“定号满洲”，实际上是在 1635 年改号之后的追认。

② 据 1957 年的调查，全国共有满族 240 多万人。经过 20 年，增加了 25 万多。

③ 《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 32 页）：“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及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原先各自独立的、几乎是由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域，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这是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国家成为民族的过程和条件。

家都还没有形成民族,那么,出现于三百多年前的满族,自然够不上称为民族。这是与史实不符的。许多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关于民族概念、民族定义、民族形成、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等理论问题,必须结合着对各国民族情况以及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我们知道,民族是历史范畴,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很大稳定性的人们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提到的民族^①通常是指从古代直到现代不断出现的具有民族共同特征的一切人们共同体,从而不能得出像人们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②的结论。

满族作为民族的长期存在,有过它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这些条件,虽然这些条件今天早已大部分消失甚至全部消失,它仍能靠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来维持。中外学者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和怀疑。但是,在满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若干问题,过去和现在,人们不但抱有一些不同意见和模糊的认识,而且还有不少错误的看法甚至反动的观点^③。本文拟就其中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的有“古代民族”、“现代民族”、“希腊民族”、“罗马民族”、“日耳曼民族”等等;斯大林也常提“落后民族”、“野蛮民族”、“被压迫民族”等等;毛泽东同志还提到“中华民族”、“少数民族”等等。

② 方德昭:《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7期,第2页。

③ [苏联]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北京:三联书店汉译本,1974年):把女真—满族当作一个中国以外的外来民族看待。当然是错误的观点。就是萧一山在其所著《清代通史》(台湾新版,1961—1963年,共五册)《导言》中说:“惟清为华族支派,久受薰陶,逐渐同化。”与他在解放前出版的《清代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页)说“都变成了汉人”,同样不承认今天满族的存在,也是很成问题的。

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得到清史和民族史研究者的批评指正。

一、满族的族源问题

目前中外学者一般公认的,两千多年前我国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①,就是今天满族的最早先人。汉代以后,不同朝代的史书上记载着的挹娄(后汉、三国)、勿吉(北朝)、靺鞨(隋、唐)、女真(辽、金、宋、元、明)是肃慎的后裔,也是满族的先人。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商讨的是:第一,过去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从明代女真人往后倒推上去,女真出于靺鞨,靺鞨出于勿吉,历代史书记载,斑斑可考;再往上推,顶多可以追溯到两汉、三国的挹娄为止,文献资料尚可依稀稽考引以为据^②。至于满族最早先人——肃慎的说法:一则先秦古籍中的寥寥数语^③,文献不足,难以征信;二则前人所说“肃慎”与“女真”系一音之转^④,从语音学角度上考虑,因“肃”字拼音系用S打头,与用J打头的“女”字,语音根本不能相通,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确实是一个问

① 一作“息慎”,又作“稷慎”,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1959年版,第43页),卷一《五帝本纪》;《国语·鲁语》下:《汲冢周书·王会解》。

②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第2812页)卷八五及《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847—848页)卷三〇,都有《东夷挹娄传》。

③ 《国语·鲁语》下只提到肃慎人贡献过“楮矢石弩”,《史记》页133,卷四《周本纪》说周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和《汲冢周书》也只提“稷慎大麋”而已。

④ 《满洲源流考》(奉天文化兴印刷所出版,1934年版)卷一,第4页下云,朱里真(女真)“盖即肃慎之转音”。

题。第二，在处理编写满族史的内容方面，要不要把明代女真人的先世——金代的女真人、隋唐的靺鞨、北朝的勿吉、两汉三国的挹娄，以至先秦西周的肃慎的全部史事都包括进去，也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

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直到金代女真人，长期居住、活动在“不咸山”（长白山）和“弱水”（黑龙江）之间的广大地区，是明代女真人渊源所自出，这一继承关系是必须首先加以肯定的。问题在于肃慎这个缺乏充分文献证明的最早先人够不够条件也包括在满族共同体之内？单从先秦古籍中只鳞片爪的区区数语，或一两个字的拼音通不通，来推断两者的系属关系，自难令人信服，所庆幸的是解放三十多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全国范畴内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许多巨大的新收获。以东北地区为例，黑龙江流域出土的魏国平原布和黑、吉两省肃慎遗址中普遍发现鼎、鬲^①，他们指出：“至于族别的问题，现在已经提出吉林地区可能是肃慎遗存的初步意见；西团山墓葬的人骨，经鉴定是属于通古斯族人种的……”^②再证以挹娄遗址中发掘的大量石铤、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农作物籽粒、纺轮和猪骨，并发现其住址为半地穴式，与史籍记载几乎完全相符。^③从而我们可以推定肃慎与挹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页；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见《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第46页；《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密切不分的一部分》，见《人民日报》1977年7月14日。

②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42页。

③ 佟柱臣：《吉林的新石器文化》，见《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第7—11页；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康原始社会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1975年第3期，第168页；吉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吉林西团山子石棺墓发掘报告》，见《考古》1960年第4期，第37页。

娄现存遗物出现于同一地域，两者出土文物的相似，文化继承关系的揭示，以及当时两者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联系，充分订正和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由于这些考古发掘资料与史书记载的互相补充印证，不难证实肃慎是满族的最早先人这个说法，是不容置疑的。

作为满族的族源，我们不但要把它最早先人的肃慎包括在内，而且还必须把从肃慎以下经挹娄、勿吉、靺鞨以至金代女真人等各族的迁徙、发展以及变化过程，有系统地、概括地一一交代清楚。同时，对肃慎及其后裔在漫长的年代中一次次分化出去，并吸收其他族人形成了新的共同体，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又与其他族人合并或融合，就不应该把这一部分人的历史（如有关渤海国和金王朝的史事）无区别地全部都包括在满族史之内。

所以，归结起来说，肃慎作为满族的最早先人，虽然史书记载语焉不详，但是考古发掘资料却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物证。至于肃慎及其后裔是既有关联又不能等同，不应该把肃慎以下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各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为满族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但是，在满族史中如果把肃慎以下迄明代女真人的世代相承的系属关系与满族割裂开来，也是不能正确反映满族悠久的历史渊源的^①。

二、满洲与明代女真的关系问题

入关前，满族统治者清太宗皇太极于1629年（明崇祯二

^① 《满族简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页。

年，后金天聪三年）亲自征明，路过房山，刚刚祭过他的祖先金太祖阿骨打和金世宗完颜雍的陵墓之后，不到二年，于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写给明总兵官祖大寿的一封信上说：“尔主（指明崇祯皇帝）非宋之苗裔，朕（皇太极自称）亦非金之子孙”^①，否认了明末女真人与宋代女真人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到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竟下了一道谕令，说什么：“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锡伯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②从此，定族名为“满洲”，废除了诸申（女真）旧称。

其实，诸申（Jušen）系从女真（Jučen）一词中的š与č发音变化而来，旧译作“满洲”、“编氓”、“部属”或“民间”^③，本来指自由民的女真人而言，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本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而下降为贱民之称。因此，在满文词书里，“诸申”就被解释为“满洲臣仆”或“满洲之奴才”^④。很显然，诸申与女真，遂由原来本为一字的同音异译分而为二，成为本族内部两个对立的阶级成分了。再则，到皇太极时期，诸申（女真）成员更加急遽向两极分化，少数上升为奴隶主，

① 《满洲老档秘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下编第22页下、第28页下，按《太宗祭金太祖、世宗陵》在天聪三年（1629年）十二月，《太宗攻锦州致书祖大寿》在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前后相距实际上不足两整年。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二五，第29页上。

③ [日]今西春秋：《满和对译满洲实录》，日满文化协会刊本，1938年版，第25、36、284、354页。

④ 《增订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刊本卷一〇，第3页上；《清文汇书》（四合堂刊本）卷九，第24页下。

而大多数下降为农奴或奴隶，诸申（女真）这一族名不再能通用于全族。何况在众多女真部落中虽各自有其专名，却还没有一个可施及全族的通称；同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了避免明末汉人对宋代女真人所引起的反感，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诸申（女真）这个世代相传的旧称改为满洲，连国号“金”也改为“清”的原因所在。

如前所述，问题很清楚，诸申（女真）这个族名虽改，但是它的族体即全体民族成员，基本上仍然是明代女真人。不过，对于明代女真人还得作进一步的分析。据记载，明朝人是把当时女真人笼统地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三个部分的。满族无疑是以建州、海西女真人为主体的，但同时也吸收了大部分野人女真在内。在满族的杰出领袖、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清太祖努尔哈齐及其继承者清太宗皇太极的眼里看来，散居在东北边区图们江、乌苏里江及以东一带的东海渥集部、瓦尔喀部等女真余部（实为野人女真），以及远处黑龙江流域及以北一带的索伦部、虎尔哈部等，从来都是同系女真成员，应该为其“所属有”^①；或者说，“此地人民（指黑龙江地方的索伦部），语音与我国（女真）同。……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②，也应该被纳入这个满族共同体之内。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皇太极所描绘的“后金”版图是：“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第4页上云：“斡儿哈部众，皆吾所属有。”按斡儿哈即瓦尔喀一字的同音异译。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二一，第14页下。

在臣服。”^①不难看出，这些被征服的外族成员，包括今天的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均属索伦部）、赫哲族（使犬部）、鄂伦春族（使鹿部）和蒙古族（厄鲁特部落）等民族成分都有。

由此可见，具有血缘关系的建州、海西女真人，在新的情况下，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为满族的主体，同时又有一些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外族成员由于种种客观条件起作用的结果，如大量被俘的汉族人加入进来，形成了新的共同体——满族。这样，满族既是主要来源于建州、海西女真人，但又加入了新的血液，把来自不同血缘的人们都汇集在一起了。

三、佛满洲与伊彻满洲的区别问题

满洲有“佛满洲”和“伊彻满洲”的区别；佛（Fe）满语，汉译“旧”的意思，故又有“陈满洲”、“老满洲”之称；伊彻（Ice）满语，汉译“新”的意思，汉字音译又或作“伊齐满洲”、“义气满洲”和“衣扯满洲”^②。按新、老满洲的意义是有发展的。入关前，在皇太极时期编入八旗的东北边区女真余部及他族人，被称为“伊彻满洲”或“新满洲”^③；而原先在努尔哈齐时期编入的则称“佛满洲”、“陈满洲”或“老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二一，第3页上。

② 萨英额：《吉林外记》（浙西村舍本）卷三，第1页下；西清：《黑龙江外记》（浙西村舍本）卷三，第1页上及吴振臣：《宁古塔纪略》（《昭代丛书》本）第11页下。

③ 《清太宗实录》卷五二，第12页上下，崇德五年（1640年）秋七月癸未条云：“以索海、萨穆什喀所获新满洲壮丁二千七百九人、妇女幼小二千九百六十四口，共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均隶八旗，编为牛录。”足证在入关以前新、老满洲之有别。

满洲”。入关后，对于在此以前编入八旗的满洲成员均称“佛满洲”、“陈满洲”或“老满洲”；此后新编入的则称“伊彻满洲”或“新满洲”^①。

据记载，佛满洲之内又有“贝国恩”和“布特哈”的区别：贝国恩（Boigon 满语，汉译“户”的意思；布特哈（Butha）满语，汉译“打牲为生”的意思^②。贝国恩多半在吉林地方成家立业，记档开户，养子育孙，世代相传；而布特哈则在长白山一带，打牲为生。伊彻满洲之内也有库雅喇的不同，因为库雅喇不是一部亦非一姓，有的人就以库雅喇为姓，也有库雅喇人而改别姓的，他们多半居住在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以东的地方，都是在入关以后才编入八旗的。可是，一般伊彻满洲则居住在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乌苏里江东西两岸，他们编入八旗又在库雅喇以后^③。

由此可知，黑龙江省的佛满洲、伊彻满洲和库雅喇都是满洲即满族的组成成员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入关以后，他们分别被派遣驻防在齐齐哈尔（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黑龙江（今黑龙江省爱辉县）、呼兰（今黑龙江省呼兰县）三城，编设八旗：镶黄、正白、镶白、正兰四旗为左翼，左翼满语叫做达斯欢噶喇（Dashūwan gala）；正黄、正红、镶红、镶兰四

① 《吉林外记》卷三，第1页下：“国朝定鼎以前编入旗者为佛满洲。”又何秋涛：《朔方备乘》（清季石印本）卷一，第7页上：“其顺治、康熙年间续有招抚壮丁，愿迁内地，编佐领隶旗籍者，则以新满洲名之，国语所谓伊彻满洲也。”又崇厚：《盛京典制备考》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卷四，第33页下一34页上云：“查新满洲人丁原在乌拉（指黑龙江）地方居住，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奉谕旨，将……三十一佐领管下人丁连眷属共一万余口俱著改住盛京，各随各牛录管理当差”云云。均可供印证。

② 《吉林外记》卷三，第1页下一2页上。

③ 《吉林外记》卷三，第2页上。

旗为右翼，右翼满语叫做哲伯勒噶喇（Jebele gala）。据道光年间清朝人的统计，黑龙江地方八旗中佛满洲所占的比例，不过十分之一^①罢了。

从清人留下的零碎的片断记载中，我们知道，有清一代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清统治者分期分批地把早已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成员移入内地^②之后，在广大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眼里，是看不出新、老满洲有任何区别的。另外，清统治者也不断把原在东北边区居住的各兄弟民族成员吸收进来，其办法分三步走：第一步，把他们从原地迁到宁古塔，住上几年；第二步，再移居到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也住上一二年；第三步，最后定居于北京^③，取得新满洲的资格，也就成了满族的正式成员。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了，入关以后，还有许多居住在东北边区的兄弟民族，如索伦（今鄂温克族）、锡伯、达斡尔（今达斡尔族）、赫哲等虽然也都编了佐领（满语叫牛录 Niru，八旗的基层组织），可是他们并没有取得满族正式成员的资格，因此，他们的编制就直接用本族的族名来命名^④，“索伦营”和“锡伯营”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特别是锡伯营从东北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被派遣到西北伊犁（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地区驻防，经历了二百多年，发展成为今天祖国民族大家庭中成员之一的锡伯族。

如前所述，新、老满洲的区别和演变，正好说明了满族在

① 《吉林外记》卷三，第2页下及《黑龙江外记》卷三，第1页下。

② 《黑龙江外记》卷三，第3页上—4页上。

③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辽海丛书》本卷下及《宁古塔纪略》，第11页上下。

④ 奕赓：《管见所及》《佳梦轩丛刊著》本，第17页上下。

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合并了大量外族成员，彼此互相接近，紧密结合在一起，增强、扩大了满族这个共同体，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血亲关系已不再是决定满族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了。

四、汉军旗人的从属问题

“汉军旗人”作为八旗制度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就算作八旗成员即满族人，是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的。因为“旗人”这一称呼是满族人的自称，更多的是汉族人对满族人的他称，从有清一代直到解放前后，广泛地在社会上流行着。当不熟悉的人见面时，问“你在旗不在旗”，就是说“你是满族人不是”的习惯用语。我们知道，“八旗满洲”（简称“满洲”）是八旗制度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主要成员，当然是“旗人”，那么，“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既然一同被编在八旗之下，享有与“八旗满洲”同等的地位，何尝不可以自称或被称为“旗人”即满族人呢？

事实正是这样，史书上明文记载着：“太祖（努尔哈赤）……肇建八旗，以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咸隶旗籍”^①。又说：“太祖……太宗（皇太极）……爰立八旗……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亦指明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②说得最确切明白的要算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的一个“上谕”

① 《八旗通志》（乾隆四年刊本）卷首序。

② 金德纯：《旗军志》，《辽海丛书》本，第1页上。

了，它说：“向来定例，满洲杀死满洲例文本未妥协，自应以旗人杀死旗人载入例条，则蒙古、汉军皆可包括。……试思八旗俱有蒙古、汉军，岂蒙古、汉军独非旗人？”^① 因此，毫无疑问，凡被编置在八旗之下的人们，不管满洲也好，蒙古也好，汉军也好，都可以自称或被称为“旗人”即满族人了。

过去在具体处理汉军旗人的从属问题时，直到清末民初，《八旗文经》^② 一书所收的旗人作家共 197 人，满洲 107 人外，还有汉军 72 人和蒙古 18 人。同样，《八旗艺文编目》^③ 一书搜集的旗人作家更多，将近 1000 人，其中满洲有 557 人，蒙古有 227 人，汉军也有 123 人。当然整个清朝三百年间，满洲、蒙古、汉军的作家实际上绝不止此数，但是，这已经足够说明前人一向是把汉军旗人当作八旗成员之一来对待的。

为了进一步证实旗人即满族成员这一点。我们不妨拿清中叶“钦定”的两部书《满洲名臣传》^④ 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⑤ 来考察一下：前书立有专传的 635 人，其中满洲 461 人，蒙古 36 人，汉军 136 人；后书收录的满洲“著姓”（151 个）、“中姓”（144 个）、“希姓”（351 个）三项合计 646 个姓氏；蒙古姓氏共有 235 个；“尼堪”^⑥（157 个）、“台尼堪”

① 《清高宗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下同）卷一四三四，第 4 页上，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秋八月甲子条。

② 盛昱：《八旗文经》，卷六〇，内文卷五六，作者考卷三，叙录卷一，共 12 册，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刻本。

③ 恩华：《八旗艺文编目》附《八旗艺文编目补》，上下两册，民国年间铅印本。

④ 《满洲名臣传》卷四八，第 48 册，乾隆年间菊花书屋巾箱本。

⑤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八〇，第 26 册，乾隆九年（1744 版）刊本。又，《八旗氏族通谱辑要》，上下两册，旧抄本。

⑥ 尼堪，满语 Nikan，汉译为“汉人”之意；台尼堪即充当台丁的汉人；抚顺尼堪即系原住抚顺地方的汉人。

(40个)、“抚顺尼堪”(50个)三项合计247个姓氏。两书所收的满洲人物和姓氏占蒙古和汉军相加之总和的三分之二弱或在一半上下；而两书都十分明确地、一点也不含糊地是把汉军的人物和姓氏列入明标着“满洲名臣”或“满洲氏族”之内。因此，八旗汉军即满族成员是历史事实，毋庸置疑。

问题发生在到了清中叶这一时期，满族人口大量增加，而汉军旗人（包括那些身份不同而名称相同的皇室贵族庄园劳动者的“汉军旗人”）的人口增长得更快更多。为了解决八旗满洲即满洲的正身旗人的生计，并企图缓和汉军旗人的反抗斗争，清统治者放宽对八旗成员的控制，首先准许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其规定“汉军愿为民者，令指定所往省分州县，呈明出旗入籍指民籍，子弟与民籍一体应试……男女听与民婚配；汉军仍愿食粮者，分派绿营改补；……汉军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盖，均留给满兵住扎；……京城拨驻满兵，俟……汉军改补绿营后，配量数目，随时请拨”^①。由此可知，汉军所遗官兵额缺，由满洲人丁调拨补充。差不多与此同时，在畿辅（今河北省东北部以及长城附近）518个庄头的名下，一次把原有的“三万余名”壮丁，放出了“应为民壮丁一万六千余名口”^②，超过半数以上。由于大量汉军旗人的出旗为民，人们会问：本来就是汉人的汉军旗人既然出旗为民，恢复了他们原有的汉族身份，那么，那些尚未出旗为民的汉军旗人不也同样可以作汉人看待吗？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九，第2页下—3页上，乾隆十九年（1754年）七月甲午条。

^②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内务府会计司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

与一贯保持自己的民族言语、习俗和民族感情的“八旗蒙古”有所不同，汉军旗人在出旗为民之前，语言、服饰、信仰、习俗各方面都受到相当程度的“满化”的影响；同样，由于满、汉两族的长期共居杂处，满人受到更多的“汉化”的影响。在今天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各族人民填报民族成分的自愿原则得到贯彻执行，特别是满族成员与原籍汉军旗人的汉族人交相互报，例子很多。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的民族成分如何划法问题，与今天的现实问题应当有所区别。按道理讲，或者从当时实际情况去推测，清代的汉军旗人中有很多人已经“满化”了，与满族成员融为一体；另外，他们中间一定也还有不少人并没有被“满化”，仍然保持着汉族的身份，始终和满族成员有所区别。可是，过去的历史是无法重现的。因此，我个人认为，清代汉军旗人的民族成分如何划法的标准只能按当时是否出旗为民作为一条杠杠：凡是既已出旗为民的大量汉军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如曾一度入旗的有名的方苞^①，即是一例），就应该算作汉族成员了；否则就应该把他们当作满族成员看待。本来，满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民族，一部分成员加入进来，另一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这是正常现象，符合一个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民族特征的。

五、内务府旗人的旗籍问题

内务府旗人指内务府三旗的成员而言。内务府三旗即从皇帝亲自统帅的镶黄、正黄、正白等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

^① 《清史列传》，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卷一九，1928年版，第25页上。

(满语 booi, 汉译“家人”之意)挑选组成,与王公们统辖的下五旗所编置的王府包衣名称、身份相同而隶属关系不同。内府三旗最早设于入关之初,1644年(顺治元年),总共只有9个内府佐领(满洲佐领)、12个旗鼓佐领(系由包衣尼堪即家奴汉人所编成)^①和1个高丽(朝鲜族)佐领,下设满洲佐领护军校,旗鼓佐领内管领、护军校各若干人,当时隶于领侍卫内大臣或称为侍卫处,到1674年(康熙十三年),正式改隶于内务府^②,终清一代不改。

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内府三旗与八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的组织体系,彼此互不相干,各自为政,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地位是不同的。因此,官员的考核^③,秀女的挑选^④,披甲当差,俸饷米石,婚丧恩赏^⑤以及刑罚处分^⑥等等,都各有各的规定,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一般说来,内府旗人的身份地位较低,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的家奴并受其重视,所以,他们外任肥差,既富且贵,权势较大。和八旗成员一样的是,内务府汉军旗人的抬旗和改旗也是允许的。按规定:“八旗汉军官员获咎,发入辛者库(满语 sinjeku,汉译“管领下食口粮人”),则改隶内务府汉军。其子孙官至三品以上,许奏请施恩,仍归原旗”。^⑦阿灵阿

① 《增订清文鉴》卷三,第24页上,旗鼓佐领条下,满文注释。

②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第3374页)卷一一七,内务府条,其后又略有增改。

③ 《内务府现行则例》(宣统三年刊本,下同)卷二,第1页上下,官员考察条。

④ 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光绪年间刻本)卷二五,第5页上。

⑤ 《内务府现行则例》卷四,滋生银两,参赏银两,恩赏银两各条。

⑥ 昭桂:《啸亭杂录》(申报馆活字本)卷八,第5页上。

⑦ 《养吉斋丛录》卷一,第2页下。

就是一个改回原旗的例子。^①而官至二品做到协办大学士的百龄不肯奏请改旗，始终隶属于内务府^②，倒是一个例外。

与汉军旗人最不一样的是，上一节已经提到，清中叶有大量汉军旗人准许出旗为民，而内务府汉军亦即包衣汉军就没有出旗为民的规定^③。原因据说他们都是皇室的“世仆”，和皇室庄园劳动者的内务府壮丁一样，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是农奴和家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由此可见，他们是满族社会阶层的最下层，是绝不可轻易地分割出去的主要组成部分。

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注意的是，过去和现在，不少红学家经常争论^④：《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先世是汉人还是旗人，是原籍辽宁辽阳人还是原籍河北丰润人，是汉军旗人还是内务府旗人，聚讼纷纭，迄今未得出一致的答案。

曹雪芹的先世，当然可以深入追查，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曹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九，第8页上，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癸未条。

② 《清史列传》卷三二，第34页下。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九，第19页上，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月乙丑谕云：“至包衣汉军，则皆系内务府世仆，向无出旗为民之例，与八旗汉军又自有别。”可以为证。

④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辑，第111页，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说“曹氏非旗人而是汉人”；第352页，萍踪：《曹雪芹籍贯》说“入关时，辽东汉人之归附者，多隶汉军旗籍，《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即其一也。《皇朝通志》及《八旗世（氏）字之讹（族）通谱》皆谓其世居沈阳，而不知曹氏本籍河北之丰润焉，尤伺《良斋文集·松茨诗稿序》：‘曹子荔轩丰润人’云云”；同页附录适之（胡适）：《曹雪芹家的籍贯》又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解放后，邓拓同志在其所著《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178页，也说：“曹雪芹毕竟是汉人，他的祖上虽然入了旗籍。”最近，白眉《曹雪芹与高鹗》云：“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过去有人认为，他的祖籍是河北丰润，今据冯其庸、马国权等同志考证，曹家祖籍确系辽阳，后迁沈阳；原属老汉军，后入满洲正白旗。”载《黑龙江日报》1980年7月27日，第3版。